



全球南方合作主义：委内瑞拉、印度和中国的公社与合作模式

塔麦巴拉拉 (Tamayba Lara), 为ROOTS撰稿

2026/06/17

探究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经济与政治替代路径，必须立足全球南方的本土化实践展开严谨审视。立足这一地缘政治研究视角，国际民众合作协会（IAPC）成功举办第五届国际网络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全球南方学术论坛、巴西若苏埃·德卡斯特罗学院与加纳24H+秘书处联合协办，搭建起一个多语言、跨区域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来自全球各地的基层社区在此深度对话，实现知识成果、理论思考与社会实践的交融与互鉴。尽管散落于不同大陆，这些基层实践主体拥有一致的社会变革历史愿景。

本次研讨会呈现一处极具深意的巧合：三位主讲嘉宾的姓氏首字母均为“S”。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萨乌尔·奥西奥·佩德雷特（Saúl Osio Pedret），系统阐释了委内瑞拉公社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架构；南亚学者苏宾·丹尼斯（Subin Dennis），梳理了印度喀拉拉邦基层民众运动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经验；来自中国的孙小微，则分享了贵州榕江侗族自治县“村超”的基层创新实践。三场跨越地域、文明与制度的分享交



相辉映，构建起一场以本土化实践方案回应资本主义系统性困境的跨文明、跨文化对话。

本次研讨会贯穿始终的核心议题，亦是本文的核心分析主线：合作社与公社体系无法在现行主流体制的工具性逻辑框架内被正确解读。二者既非依附于资本市场的经济交易单元，也不是单纯用于纾解贫困、缓解社会矛盾的救助式、补偿式发展工具。与之相反，这类基层实践为社会深度民主化、构建地方物质主权、抵御跨国资本主义掠夺性逻辑筑牢了社会根基。其核心价值在于真正激活了民众主体力量，推动人民基于自身切身诉求、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与阶级长远利益，主动参与并推进社会变革进程。

委内瑞拉：公社与公社经济

萨乌尔·奥西奥·佩德雷特在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委内瑞拉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他指出，委内瑞拉公社体系的政治根源，可追溯至1999年启动的制宪改革与社会革命进程。这场变革重塑了国家治理形态，推动该国从依附西方监护的代议制民主，转型为主权自主、民众参与的主体性民主模式。这位政府副部长表示，此次转型的核心目标，是终结该国历史上的掠夺式国家治理模式，完成国家治理的去殖民化改造。委内瑞拉曾长期深陷殖民农业发展桎梏，后又过度依赖石油资源掠夺型经济，沦为外部势力的资源附庸与利益后院。针对代议制体制遗留的官僚僵化难题，萨乌尔·奥西奥·佩德雷特提出，公社模式复兴了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提出的前马克思主义“地治”理念，即由社区自主界定本土文化特质与物质资源禀赋，实现辖区领土的自主治理。

在这一治理架构中，社区委员会是整个体系的基础组织单元。委员会下设各类专项工作小组，公民根据自身能力与意愿自愿加入，协同解决辖区内各类具体公共事务。委内瑞拉公社体系并非照搬域外模式，而是多个社区委员会在公民大会框架下，基于共同的领土边界、交通水系、资源禀赋与生产潜力，自发聚合形成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各主体通过集体议事划定治理边界、明确权责范围，并以章程形式确立共同体运行准则。绍尔强调，公社实行全民大会、扁平化的自治运行机制，不设总统制层级架构，通过每三年一届的发言人公开选举机制，实现基层治理领导层的常态化迭代与更新。

在主讲人看来，公社是集治理功能与领土主权于一体的综合性实体。该体系与国家核心革命领导层协同联动，将国家安全与防御战略落地到基层领土，有效保障了地方政治与社会稳定。这一基层治理架构是委内瑞拉五权分立国家体系的去中心化延伸，通过六大核心机构的集体协作运转落地各项治理职能。六大机构的具体职能如下：



- **公社议会**：制定公社章程与地方经济发展规划，规范辖区内社区公共生活与主体互动秩序，行使基层立法职能。
- **执行委员会**：落地落实地方公共政策，统筹资源配置，协调住房、教育、公共服务等专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 **社会监察局**：对公共政策落地实施全过程、透明化的监督与管控，保障公共资源合规使用。
- **司法与和平委员会**：基层司法监督与纠纷调处机构，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和平法官负责调解社区矛盾、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 **选举委员会**：统筹负责辖区内各类民意咨询、内部选举等民主程序的组织实施工作。
- **公社银行**：统筹管理、盘活配置国家下放的各类金融与非金融资源，打破西方资本主导的金融运行逻辑，保障地方经济自主权，摆脱传统国家行政体系的过度管控。

为直观印证公社体系的落地成效，绍尔援引官方数据介绍了项目发展规模。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共有约4.9万个社区委员会，其中4万个已实现规范化成熟运营，整合组建为4092个依法设立、架构完善、运转有序的基层公社。受石油资源租金型经济影响，该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致使60%的公社集中布局于城市区域。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公社经济仍蓬勃发展，持续在领土治理与经济自主层面争夺发展主动权。通过国家向基层社区下放土地、生产资料及公共服务职能，规范化的社区组织逐步积累经济实力，着力构建生产型公社经济，彻底突破资源租金依赖模式及官僚体系带来的发展扭曲。

绍尔指出，公社直接社会所有制企业（EPSDC）是基层经济实力的核心载体，这类企业在公社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统一管理生产资料。他重点厘清了该模式与传统合作社的理论及政治边界：传统合作社虽为集体所有，经营收益仅惠及社员个体；而公社所有制归属全体公民大会，生产剩余需在整個公社辖区内统一分配、统筹投入，实现全域社区普惠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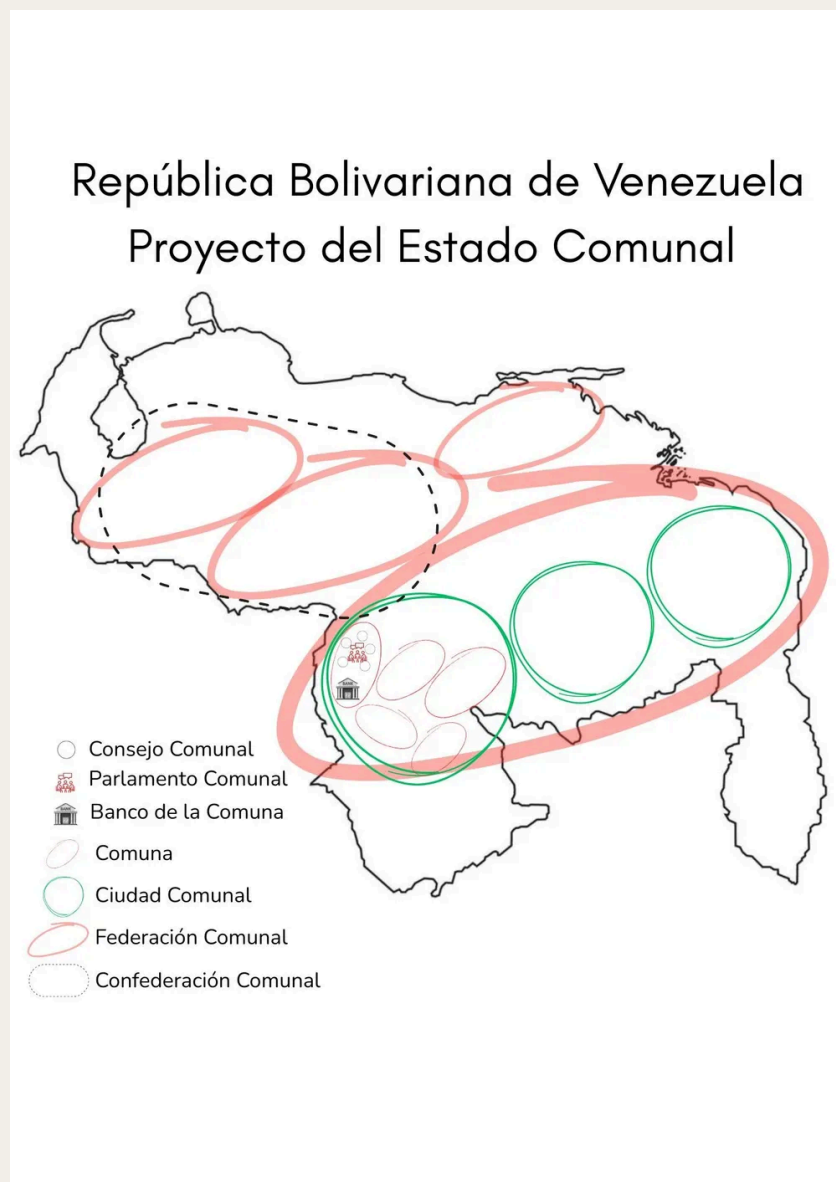
公社咖啡产业项目，集中体现了公社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价值链的博弈优势。绍尔介绍，在这一传统农业领域，农户保留自有咖啡园的所有权，公社则战略性掌控产业链核心增值环节，咖啡加工、烘焙等核心工序均由农村公社集体厂房统一完成。2024至



2025年，该模式取得历史性突破，当地公社实现首批咖啡直接出口，外汇收益全部回流本土，用于升级生产设施、解决社区民众通过大会议定的核心民生问题。

秉持“人民拯救人民”的发展理念，委内瑞拉在2025至2026年持续推进水稻、玉米核心粮油产业链自主可控，打破了经济精英对农工业体系的长期垄断。农村公社直接接管粮食仓储设施与水稻加工产业，并与城市公社的统筹分配体系无缝对接，重构了农产品流通链条，砍掉中间冗余环节，大幅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消费成本。

目前，公社农粮体系正持续拓展布局，推进黄玉米、大豆种子本土化生产，以国产种子替代饲料进口原料。随着国家逐步将各类生产基础设施移交基层社区共同体，民众自主掌控的生产体系已保障全国98%的物资供应能力，其中本土食品自给率超70%，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地图，附公社聚合体系图示。来源：《公社组织法》/塔麦巴拉拉

总体而言，社区委员会与公社体系既是基层领土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载体，其内部亦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张力。该体系以构建社会主义公社国家为战略目标，对传统国家治理的权力逻辑形成根本性突破。因此，委内瑞拉公社绝非单纯的基层治理工具，更是孕育社会系统性变革的鲜活载体。

印度喀拉拉邦：左翼视角下的合作社发展实践

第二位发言人是印度经济学家兼社会活动家苏宾·丹尼斯（Subin Dennis）。他的分析聚焦于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喀拉拉邦人口约3500万，于1956年合并了英国殖民时期保持从属同盟关系的三个马拉雅拉姆语地区——特拉凡科尔、科钦和马拉巴尔。丹尼斯介绍了喀拉拉邦左翼力量发展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该邦通过反封建斗争、社会改革行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斗争，积累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在选举层面，建邦后，印度共产党于1957年赢得立法多数，推行了土地改革，并创办了多所公立教育机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两大联盟交替执政的格局在邦议会逐渐巩固。主讲人重点介绍了左翼民主阵线的历史作用。该阵线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在1957—1959年、1967—1969年、1980—1981年、1987—1991年、1996—2001年、2006—2011年及2016年—2026年四月多次执政。据丹尼斯介绍，这一持续深化民主、推行农业、卫生与公共教育政策的进程，使喀拉拉邦跻身全国社会指标最高行列：识字率最高，工资最高，预期寿命最长，婴儿与产妇死亡率最低。

丹尼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为方法论依据，对这一体系展开分析。他援引马克思的论断指出，由工人自主管理的合作工厂是旧形式内部萌发的新事物之嫩芽，超越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工人得以使用生产资料来雇用自身劳动力。然而，主讲人也警示了这一模式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运作时的客观矛盾与局限。由于合作社不能消除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它们可能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削弱阶级团结。同样，若不融入计划性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无法从结构上消除失业，且始终面临潜在风险：部分企业兴旺，另一些则陷入破产或长期依赖国家补贴。

尽管面临上述历史挑战，喀拉拉邦的合作社主义仍作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力量面对物质危机与社会排斥的有组织回应而得以兴起。丹尼斯系统梳理了该邦的先锋合作社模式，全邦共有23167个合作社：



ULCCS（乌拉龙格尔劳动合同合作社）：成立于1925年，是对种姓制度歧视的有组织回应。该合作社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建筑工人合作社，位居全球合作社排名第三。董事会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与基层工人领取同等薪资。

喀拉拉邦迪内什比迪（Kerala Dinesh Beedi）：成立于1969年，是应对私营传统烟草厂关闭的抵抗阵线。彼时工厂主宁可关厂，也不愿为工人提供体面工资和社会保障。

鲁布科（Rubco）：1997年成立，旨在缓冲天然橡胶国际价格骤跌对农业经济造成的冲击。

米尔玛（Milma）：喀拉拉邦牛奶合作社联合会，负责乳制品的收购与分销，秉持“喀拉拉邦人民以米尔玛的馈赠迎接每天”的社区理念。

合作银行业是这一体系的战略支柱。它将农村贫困家庭从高利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该体系传统上分为三个层级：基层农业信用社、区级银行与邦级银行。2019年，区级机构合并，共同组建了喀拉拉邦银行。该银行目前在全邦各镇设有3481家支行。丹尼斯用数据揭示了这一网络的实际分量：喀拉拉邦的1607个基层农业信用社仅占全印度信用社总数的1.5%，但截至2022年，其储蓄会员数占全国储蓄会员总数的17%，贷款会员数占全国贷款会员总数的24%。

有人质疑，合作社是否只在共产主义力量强大的地区才能涌现。对此，丹尼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将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进行比较：西孟加拉邦左翼执政数十年，却未能发展出同等规模的合作社力量。丹尼斯认为，合作社网络的建设与巩固并非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政治意志、制度优先事项与方法论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使这些实践面临严峻挑战。丹尼斯解释道，喀拉拉邦迪内什比迪等合作社为成员提供先进的薪酬与权利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带薪休假及医疗与周日补贴。这使其每生产千支烟的平均工人工资达530卢比。相比之下，喀拉拉邦的私营烟草厂支付的工人工资不足200卢比，邻邦更低至100至180卢比之间。这种不对称大幅抬高了合作社的运营成本，削弱了其在开放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何约24%的邦注册合作社处于停业、不运营或清算状态。

市场压力之外，右翼势力还发动了地缘政治与制度层面的攻势。主讲人警告指出，极右翼组织已掌控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地的合作社领域，而印度中央政府目前已在邦级层面设立合作部，其明确目标是干预并争夺对喀拉拉邦活跃合作社体系的



控制权。面对这些威胁，丹尼斯重点介绍了库都班什利 (Kudumbashree) 的作用。这是一个以合作社原则为基础的社区组织，汇聚了逾400万名女性。截至2025年3月，该网络维持着约15.79万家集体微型企业，雇用逾31.8万人，涵盖服装制作、餐饮、健身、托育以及集体农业单位 (Sangha krishi)。在后者中，女性在政府支持下共同租用和耕种土地。

托马斯·艾萨克 (Thomas Isaac) 将喀拉拉邦合作社主义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核心维度：为农业与工业重组提供基本社会保障、通过银行重组将资源导向发展，以及依托 ULCCS 等民主、伦理机构投资宏观基础设施。然而，领土上的具体实践揭示出这些规划目标与市场物质现实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第二和第三个维度已通过喀拉拉邦银行的巩固以及公共工程的透明、高效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农业与传统产业的合作化现代转型，仍因资源长期匮乏和全球化竞争压力而困难重重。这一对比表明：只要印度国家仍然锚定于资本主义结构，地方合作社就只能作为工人阶级的抵抗阵地和福利保障机制运作。若不将其持续纳入长远政治议程，其整体变革潜力将始终受到限制。



乌达亚普兰合作社工人海报，2025年。来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万希卡巴巴尔（社会主义青年艺术家）

从主讲人的深刻阐述可以推断，喀拉拉邦的合作社主义在双重历史条件下运作。一方面，它是有组织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物质成就之一，能够通过掌控信贷与公共工程来巩



固社会结构、重新分配农村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印度层面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宏观经济框架，这一模式不得不在去管制市场与右翼中央政府制度围攻的双重压力下，进行一场消耗性的阵地防守战。因此，它的持续存在不依赖于制度惯性，而取决于其基层的思想动员。

中国（贵州）：村超、足球热情与共同繁荣

研讨会第三位发言人孙小微，分享了中国文旅、体育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基层创新实践。她以自身工作经历为引，生动阐释了干部下沉基层的特色制度安排：她原本任职于北京从事人才管理相关工作，后被选派前往西南贵州省榕江县，担任乡村基层干部。孙小微表示，这项制度设计意在推动专业干部深入乡土一线，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让公共政策立足本土群众的现实需求落地生根。

榕江县曾是全国深度贫困县之一，于 2020 年末如期实现全面脱贫。2021 年，当地政府联合各村社区，多方探索适配本土发展的特色路径，力求挖掘本土人力禀赋、激活县域内生经济动能，寻找一项可常年开展、全民广泛参与的可持续特色活动。最终，民间自发热爱的足球成为破局关键。经历新冠疫情期间长期居家隔离后，群众积压的社交需求与集体情感找到了宣泄载体，2023 年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村超”）迅速在社交平台出圈走红。这场由群众自主运营管理的赛事，成功将线上流量、网络关注度转化为实打实的县域经济增量。

孙小微特别提及 2025 年 6 月一场全民共抗灾情的集体行动：彼时榕江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至居民楼房三层，核心足球场被厚厚的淤泥覆盖，完全无法投入使用。得益于“村超”在群众心中深厚的认同感与情感联结，数千名本地群众与海内外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支援。仅耗时一个月，众人合力完成全城清淤、集体后勤保障、球场修复重建等全部工作，赛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恢复举办。这一经历直观印证，依托自下而上的群众自治组织，基层民众拥有抵御灾害、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贵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实现新媒体传播、文旅产业、群众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当地系统性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教会村民运用手机、摄像设备作为新型生产经营工具。传播权下沉带来的全民宣传格局，让老年人、青年群体都成为家乡推介者，线上直销本土农特产品、服装合作社手工民族织物，省去多层传统经销中间商。

足球成为串联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完整生态的核心纽带，人民群众始终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主体。赛事休赛间隙，足球场变身开放式公共舞台，少数民族传统歌舞、民族



服饰巡游轮番上演，拉近了原本分散独立的村落社群。大量游客涌入直接带动食宿行业蓬勃发展：全县酒店从仅 1 家，发展至 8 座以上四星级综合文旅配套，住宿床位由 5900 张扩容至 12800 张。为维系良性旅游市场环境，各村自发形成监督机制，严控餐饮、交通行业哄抬物价、投机牟利行为，稳定亲民的消费价格积累了良好口碑，游客复访率持续走高，也吸引无人机、智能交通工具等科创企业落地，将赛场作为新技术展示平台。

人才回流与本土人才培育，是这套发展模式的核心支撑。榕江地理位置偏远，长期以来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乡村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突出。而“村超”充分认可本土乡土技艺与民间智慧，扭转了劳动力单向外流的局面，成为吸引青年返乡、牵头落地乡村发展项目的重要平台。现阶段，当地为赛事制定三步走长远规划：夯实本土联赛根基、常态化举办全国民间足球友谊赛，长远面向全球，邀请世界各地基层社群携本土特色文化同台交流。

整套发展生态依托“村超”品牌建立规范透明的集体收益分配机制。赛事与外部企业合作产生的全部营收归集至国有平台公司，遵循集体所有制规则拆分使用：

51% 收益用于壮大各村集体经济，补充乡村合作社经营周转资金；

49% 收益回流赛事运营，涵盖活动举办、技能培训、球服采买，以及青少年球队、群众啦啦队的各类后勤保障。

阳光女性合作社是多元增收模式的典型缩影：合作社女性成员日间务农，依托线上渠道售卖生态农产品；晚间进驻赛场提供集体餐饮服务，同步从经济增收、文化共建两个维度丰富社区生活。这套运行体系同步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摆脱以往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向统筹引导、供给基础公共服务。政府统筹完善全套硬件配套，建成标准化球场、停车场、公共卫生站点、线上电商平台，还开通贯通深山村寨与县城中心的免费接驳巴士，确保发展红利直达基层群众。孙小薇将这套发展模式总结为四大支撑支柱：“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民心有情，科技有力。”



2023年，“村超”（Cun Chao）一夜之间风靡全国。来源：中国日报/新华社

中国榕江的实践，为处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极具根本性的方法论借鉴。该模式取得成效的核心，并非单纯依靠外部资金输血或是自上而下的技术帮扶，而是发掘、激活根植于群众内心的情感与文化内生力量——当地民众对足球发自内心的热爱，正是撬动区域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这套机制让市场发展服务于社区整体需求，同时借助普惠化数字传播渠道打通流通中间商。榕江的合作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大众休闲、民族文化认同与集体经济生产能够深度融合，塑造具备自主发展权的在地发展形态，为新型社区生活模式提供了可行范本。

结语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总结发言由主持人尼提什·纳拉扬（Nitheesh Narayan）完成。他整合三位发言人的分享内容展开综合评析，提炼出三类实践在政治逻辑与实践方法上的共通内核。主持人在总结中明确提出：尽管三项实践分处不同大陆，依托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差异化制度环境，却拥有完全一致的变革内核。倘若跳出单纯商业化视角，以整体性、全局性视野谋划合作经济实践，就能持续推进社会深度民主化，把关乎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发展的主导权交还广大人民。

针对委内瑞拉的实践，主持人评价，公社治理体系以现实案例印证，群众参与、属地自治能够把集体决策转化为常态化的自主治理行动，农户自主把控咖啡加工、出口全产业链便是典型例证。谈及中国“村超”，总结发言指出，榕江各类合作社以足球这一承载群众深厚情感的文体载体为纽带，联动激活本土生产力与文旅产业，全方位保障群众共同享有体面、富足的生活。而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则说明，当地完备的合作社



网络与乡村信贷体系，支撑起全印度领先的民生发展指标，这一切是数十年持续开展反封建、反殖民、反种姓压迫的工人运动与政治奋斗积淀而来的历史成果。

第五届国际网络研讨会至此落下帷幕。论坛并未将三套实践方案塑造成可以直接照搬、一成不变的标准化模板，而是把三者绘制成一套独立自主替代发展道路的参照图景，成为指引全球南方民众开展社会变革的思想坐标。这批饱含群众抗争智慧与本土创新活力的实践成果，也搭建起通向第六届研讨会的坚实国际主义桥梁。下一届论坛将聚焦加纳多元厚重的基层民众斗争实践，持续深化国际集体交流，凝聚共建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合力。